

## 【心香一瓣】

□李绍强

田昌五先生(1925—2001),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今年是田昌五先生90诞辰,也是恩师逝世的第14个年头。我作为田先生的关门弟子,对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1995年,我已经38岁,为了充实自己,更是仰慕先生的学问,于当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成为先生的一名博士生。入学前请教过先生几次,也看了先生的一些论著,但印象都不是很深。开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先生在他家中给我们开设《史学理论》课。上午9点,授课开始,先生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我一边凝神听讲,一边飞快地做着记录。当看到先生并无讲稿时,我不禁有些疑惑了。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先生连续讲课三个多小时,却毫无倦意,我们被先生精彩的讲授内容和激昂的手势所吸引,也没有发现已经12点多。此时不知谁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像连锁反应,我们都感到有点饿了,但谁也不敢有所表示,因为先生的讲意正浓。经过几次之后,我们也有了思想准备,早上多吃一点,以免肚子受苦。先生讲课不看讲稿,旁边只放一个小黑皮笔记本,这是否就是讲授内容呢?好奇心驱使我趁先生中间休息时翻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只有几个讲授的题目,其余什么也没有。我大感佩服!先生把这一学期的讲授内容全部装入了大脑,而且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用史料,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令我等自愧不如。后来听师母说,先生的记忆力在原来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都是很有名的,经

## 忆田昌五先生二三事

典的作家名言如果找不到出处,问先生即可。

师母在北京照料孙辈,不能随先生到济南,先生以70岁高龄独自在山东大学工作、生活,真是难为他了。不过先生的生活能力很强,能炒一手好菜。1995年初,我第二次见先生时,他一时高兴,竟为我亲自下厨,我记得有香菇油菜、罗宋汤等,其色香味不次于酒店大餐。虽然先生能照顾自己,在这方面比其他老先生强得多,但毕竟一个人生活,弟子们尽力去服侍,也有照顾不到之处。后来大家回忆说,先生生活不规律,可能是造成生病的原因之一。后来,我负责给先生送报纸信件,因此和先生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我一般晚饭后7点多钟到先生家,除送信件外,主要是就论文写作请教先生。此时他刚做好饭,经常邀我一起喝两口,恭敬不如从命,我也就坐下陪先生了。饭后,先生高谈阔论,天南地北,但主题不离学问,我带着疑问而来,茅塞顿开而去,一直到论文完稿答辩,不知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我是田先生的95级博士生,因为年龄的关系,先生以后不再带学生,我们几个成了关门弟子。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生对我们抓得特别紧。第三学期开后,我们开始查找资料,忙碌起来。关于论文题目,先生其实早有考虑。自1987年先生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到山东大学后,带博士生之余,一直进行他的学术体系构建,到我入学时,已基本形成,这就是历史大循环理论,这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有很透彻的论述,所以我们几个人的论文就

是从隋唐两宋明清等各个时期对先生的理论做进一步的阐发(先秦至魏晋时期已有其他师兄去做)。由于我入学前主要从事明清史的教学科研,因此先生让我做明清工商业形态方面的研究。这对我是个全新的课题,以前从未涉及,尤其是做这样一个跨度大、层面多的研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就这个选题我去请教黄冕堂教授,他非常直接地告诉我:这个题目太大,很难写。我心里有些犯难了,怎么办呢?先生似乎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成竹在胸,后来的进展果如他所料。带着疑惑,我开始看书查资料、做索引。很多百思不解的问题,经先生点拨之后,迎刃而解,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转眼三年过去了,1998年6月初,我们进行了论文答辩,邀请了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武汉大学熊铁基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黄冕堂、安作璋、孟祥才、乔幼梅、王育济等教授,各位先生对我的论文表示赞许,答辩顺利通过。望着先生略显疲惫的面容,我心中回荡着感激的潮涌,三年中向先生请教的各种情景不禁又一一再现。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曲阜师范大学,在繁重的教学之余,继续修改扩充我的论文,其间仍不断向先生请教一些疑难问题。2000年3月,论文修改扩充基本就绪,请先生过目后准备出版,这时我请先生给论文写一个序,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却音信全无,我想可能先生太忙了吧?那边出版社就要开印,我也不敢催促先生。等到先生写好后,我简直不敢相信,序言竟然洋洋一万余字,

文中更是议论精妙,中西跨越,足显大家之风范。序言给我的书增色甚多,也使学生的论文内容相形见绌,看来先生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啊!书出版后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本,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01年春,我又去济南看望先生,这时发现先生有些消瘦,他说可能胆囊有点毛病,言谈之间却毫不在乎。因为先生身体一向康健,加之有其父母高寿遗传基因,因此他对自己的身体较为自信。但先生的生活方式似乎不太科学,首先是70多岁高龄仍然熬夜写作,1998年春赶写史学理论专著,竟然通宵达旦,每晚写一万多字,结果臂膀疼痛,无法握笔,只得暂停。后两年听说先生仍然非常勤奋,一年竟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吃惊之余,我暗暗为先生担心,毕竟是古稀之年,这样拼搏,如何吃得消?其次是先生喜欢烟酒,一日三餐和睡眠都不太规律,天长日久,损害了先生的健康。当看到先生憔悴,劝其节劳时,似乎为时已晚。2001年5月,先生查出癌症住院治疗。

田先生离开我们已近14年了,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工作和生活了15年、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的山东大学有了很大发展,今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要在此举行,届时将有2000余名国内外著名史学家云集济南,由此显示出山东大学的雄厚实力和影响。田先生的众多弟子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成长起来,取得较大成就,这些都足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天下叫文峰的塔肯定不止这一座,但我独记住了它。

我说的是我童年在黔南都匀的文峰塔。每年的“六一”,都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不用上课了,统一换上白衬衣、蓝裤子,胸系红领巾中,跟着班主任李老师去都匀市区游玩。我第一次看见了文峰塔。它扎根脚下的土地,濒临剑江龙潭,周遭荒草蔓生,瞧上去灰头土脸,塔身裂开了一道道缝隙,仿佛有谁正羞羞答答地推开一条门缝向外张望。那时我还小,没觉得它有多高,心里认为它是一个驼了背的老人,牙齿也掉光了,说话就漏风,好像风中之烛,稍不小心,就会自己绊倒自己,重归一堆石头。我最好奇的是想知道里头藏着些什么秘

## 【性情文本】

## 南方:文峰塔

□简默

密,我想象它应该像那个神奇的宝葫芦,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待我贴近那些冰凉的缝隙朝里张望,就像隔着门缝打量自己的童年,我看到的除了狭长的黑暗还是狭长的黑暗。这时我又渴望着破门进入它的内心,摸摸它的心跳,听听它在自言自语些什么,我在心头喊了一万遍“宝塔开门”,它愣是硬着心肠不开门,我只得放弃了进去的念头。

春天来临了,桃花盛开了,细雨押着韵脚降落了;夏天接踵而至,更多雨水从天倾盆泼下,落到龙潭之中,潭水暴涨了。那时龙潭水尚清澈如一面天然镜子,里外透明坦荡,映得出花红草绿,更映得出文峰塔影,只见塔倒映水上,仿佛拓下一般,水迹淋漓,生动逼真。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地方,只要埋下了我的胞衣,就是我永远的故乡,是我乡愁的源头。相比之下,纸背上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籍贯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似乎是一缕轻轻的梦。

埋有我胞衣的都匀正是这样的地方。她默默地看我长至十四岁,目送我转身回到山东,而我将她包括文峰塔收藏入我的记忆夹中。

待我重返都匀,是在近三十年后,我已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沧桑中年人,我是来寻觅我遗失的童年和故乡的。

历尽劫波的文峰塔依旧矗立,依旧朴素得没有任何装饰,它周围建起了公园,以它为主题就叫文峰园,成为城市的中心。我缓缓地走近它,以目光抚摩它,渐渐地了解了它的前生和今生。

文峰塔的前生是文笔塔,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一座五层木塔。古代中国建塔,其中功能之一便是流转风水,文笔塔恰有此功能。当时都匀东、西、北三面皆有山峰,唯独正南面缺少一峰,造成水口散漫,故在此建塔。文笔塔拔地立起,似一根如椽巨笔,直指文曲星,寓意文曲星经此下凡。说来也怪,文笔塔落成前都匀无人考中进士,之后则层出不穷。木塔最终不堪岁月重负倾圮,仅存塔基形影相吊。此后屡议在原址上建塔屡辍,直至1839年才在原塔基上修建石塔,易名为文峰塔。自此,文峰塔崛起于文笔塔母体之上,二塔跨越数百年往事,终于合为一体了。

文峰塔为七层密檐式六角形石塔,下有正方形青石塔基,依照砖塔的建筑方式逐层构筑,在承重结构上则仿照它的前生——文笔塔。塔顶攒尖收顶,置一铁质塔刹,造型古朴。它符合中国传统古塔的建造规律和审美理想,比如系特征显著的密檐式塔,比如塔的层数为单数,又比如“无塔不刹”,建成后号称“贵州第一塔”。

了解了文峰塔,我为我儿时的幼稚想法而感到好笑,因为像这种密檐式塔无论是空心抑或实心都不能进入。林语堂如是说中国的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塔当然是风景的一部分,它与寺庙亭台楼阁相偕,浑然天成成为“中国的风景”;它既与自然和谐共存,又是人文历史的浓缩,塔刹的高度就是一个地方文明的高度。人们习惯站在塔底发古思幽,仰望它的身影,倾听它的脉搏;登临塔顶凭栏望远,游目骋怀,自身也成为风景。

而对我来说,眼前的文峰塔也是乡愁的一部分。我无数次在回忆中重温收留我胞衣的都匀,无数次文峰塔根深蒂固地闪现在我的梦中,当我悄悄地接近它时,它却慢慢地向后退,在四周高楼和霓虹灯的包围之中,它看上去疲惫至极。

在我的心目中,都匀最高的建筑不是烟囱,也不是摩天大厦,而是文峰塔,隔着千山万水,踮起脚,手搭凉棚,远远地望见它的塔尖,我的乡愁就有了寄托,我的宗教就有了皈依,我的故乡也不再沦陷。

(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

## 【名家背影】

□宋致国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作为微山人,不管是在激情燃烧的迪厅,还是置身在静悄悄的微山湖畔,只要听到或唱起这首明快、激越的红歌,心底就会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且会发发自肺腑地来一句:当谢刘知侠!

其实,在这举世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恐怕不独于我,只要读过、看过《铁道游击队》小说、电影、电视的人们,有谁能不从心底说一句“当谢刘知侠”呢!是作家刘知侠准确记录了微山人浴血奋战的抗日历史,是作家刘知侠再现了当年鲁南乃至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画面!

然而,当我33年前置身东海之滨的招远万米金沙滩上(当时在招远凤凰岛参加齐鲁作家、记者联谊会),郑重地向他老人家当面致谢的时候,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不是该谢我,而是该谢不畏强暴、勇于献身、舍生忘死,为了民族的屈辱而浴血奋战的微山人!是他们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感染了我,是他们的英雄热血激发了我!

月朗星稀,海风轻抚着面颊,漫步在柔柔的沙滩上,知侠老师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抗日战场……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自幼生长在河南汲县一个贫困的铁路工人之家。他缘何一下子热爱上了鲁南山水,成了一个地道的山东人呢?他的夫人刘真真大姐说得好:是鲁南、鲁西南人民的热情、奔放感染了他的!

1943年,刚进而立之年的刘

## 当谢刘知侠

知侠,抗大毕业就被分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临沂),成为《华东前线报》的战地记者。一踏入微山湖区、运河两岸,他就爱上了这片热土,就日日夜夜和微山湖畔的“老洪”、“小坡”、“芳林嫂”们战斗在一起。加上他从小就随父亲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对无限延伸的铁轨有种特殊的感情,因而一经投入鲁南的战地生活,就被枣庄临城的铁道、微山湖的芦荡、蒲丛火热的战斗生活所吸引……于是才有了这发行300多万册,译成英、俄、法、德、朝、越多国文字的《铁道游击队》。

“是《铁道游击队》让他成了作家,也是《铁道游击队》让他在‘文革’中饱受磨难……”

刘真真大姐的话,把我一下子带入了那不堪回首的“文革”岁月。刘知侠不但写英雄,亦是抗日英雄,正如他的战友刘亮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写的那样:1944年冬,日寇趁鲁南人民过年的机会,偷偷派五万重兵偷袭滨海抗日根据地。作为战地文工团副团长的刘知侠,危急关头,指挥若定,一边组织老弱人员转移,一边组织有战斗力的人员殿后,是他的临危不乱,有效地粉碎了日本鬼子的春节偷袭!但是,正因为 he 如实地记下了鲁南人民特别是微山湖区人民的真实抗日故事,而没“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其作品在十年浩劫中被批为“毒草”,特别是铁道游击队掩护刘少奇过湖的“第七十二章”,更是成了他直接被打入牢狱的罪证,直到1977年9月《铁道游击队》再版,胡服(刘少奇)过湖的章节仍被删除。

我是读着《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



刘知侠(右)与《铁道游击队》中刘洪大队长的原型刘金山合影

小说、看着《老洪飞车搞机枪》的小人书长大的,特别是“李正”的原型——鲁南独立支队副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的文立征,就壮烈牺牲在和我村一河之隔的丁家堂村,更让我从小就有了说英雄、学英雄的“铁道游击队”情结。

刘知侠是真正的作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两句最形象的“关键”:关键是先发

制人,如不能“先发”,那就应是“后发”制人。所谓“先发”就是你善于发现,善于先发现。他说,我不是天才的作家,我的《铁道游击队》其实是“先发”制人的结果!是我时时在他们中间摸爬滚打,亲眼目睹了老洪、小坡、芳林嫂们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后而一发不可收地写出的。不是亲睹,就是亲历,爬火车,搞机枪,炸桥梁,那可不是凭“构思”就构思出来的。应该说那都是被英雄们感染得我不写不行的素材!谈起此,刘老深情地告诫青年作者一定要在“先发”和“后发”上下工夫。

所谓“后发”制人,那就是要在先发制人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避免材料的平铺直叙、简单罗列,要加以精巧地构思。试想当年亲身经历、听说抗日战争的记者、作家有多少?为什么没有写出更多优秀的抗日题材作品?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先发”和“后发”的有机结合。

刘老的“经验”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先发”、“后发”的理论正如他的为人,直来直去。试想,他的作品,甭管是小说还是话剧,哪些不是靠他的深入“先发”继而精心“后发”才写得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而闻名于世的呢?

如今刘老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而他写作的“先发”、“后发”的教诲,亦仍在耳边回荡。作为微山人,当谢刘知侠!作为今天携手共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热爱和平的人们,更应该感谢刘知侠吗?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